

“9·11”后中美关系五年评估

郑 保 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0)

[作者简介] 郑保国(1959-), 男, 湖北应城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研究。

[摘 要] “9·11”后中美反恐反扩散合作使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但是, 由于“9·11”后美国实施“高调反恐反扩散和低调遏制潜在敌人”的对外战略, 打着反恐反扩散的旗号谋求全球霸权, 因此中美在人权问题与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和在军控与地缘战略领域的深刻矛盾依旧, 美国在反恐反扩散的同时继续强化“以台制华”战略, 企图通过与中国的“强硬接触和有限合作”遏制中国崛起和把中国纳入其主导的世界秩序。所以, “9·11”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基本上是小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之后的恢复性改善, 并没有发展到 30 余年来的最好状态。

[关键词] “9·11”后; 中美关系; 反恐反扩散; 台湾问题; 恢复性改善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7)02-0183-06

“9·11”事件以来, 中美(尤其是美方)不乏夸大中美关系改善幅度的观点。2003 年 9 月 5 日,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在华盛顿大学说, 中美关系正处于尼克松访华之后的最好时期, 后来他多次重申此观点。沈大伟认为, “9·11”后中美关系进入了自 1989 年以来最好的时期^[1] (第 44-48 页)。2003 年 12 月, 美国《新闻周刊》载文认为, “从白宫鸣放 19 响礼炮到美国领导人对温家宝极尽溢美之词表明: 与欧洲相比, 中国现在是美国更亲密的盟友”。2005 年 9 月 21 日, 时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的佐立克在《中国向何处去? ——从成员到责任》的演讲中把中美称为“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 被中美媒体普遍解读为是对中国的友好表示。

笔者认为, 虽然“9·11”后中美关系明显改善, 但不能夸大改善的程度。本文主要通过深入分析“9·11”后 5 年来中美政治、安全关系, 对中美关系改善的程度和性质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

一、“9·11”后中美关系明显改善

2001 年初, 新的布什当局宣称中美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战略竞争对手, 并在 4 月中美撞机事件后采取一系列恶化中美关系的步骤: 单方面中止中美一切军事交流, 宣布向台湾出售大批先进武器并宣称要武力保卫台湾, 抓紧研发导弹防御系统(MD), 加快其全球战略重点东移和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因此, 刚跨入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然而, “9·11”事件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事发当天, 江泽民致电布什, 对恐怖袭击表示强烈谴责, 对美国表示深切同情和坚决支持。中国不仅支持美国对阿富汗动武和向亲美的阿富汗临时政府提供 1.5 亿美元紧急援助, 而且对美军进驻中亚和日本海军首次在印度洋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的异常行动保持沉默。布什当局不再称中美是战略竞争对手, 表示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阿富汗战争期间, 布什毅然出席在上海举行的 APEC 第九次峰会, 并就反恐合作和台湾问题与江泽民会谈, 双方一致决定把中美关系定位为“建设性合作”关系。此次会谈表明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 从此中美最高层保持频繁会晤与沟通。

2002年2月下旬,布什应江泽民邀请正式访华。他选择在被称为“破冰之旅”的尼克松访华的30周年纪念之际访华,并在游览长城时在当年尼克松止步处象征性地再向前迈进了一步,以示促进中美关系的决心。

2002年4月底5月初,胡锦涛应切尼邀请首次访美,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尤其是台湾问题,与布什、切尼、鲍威尔、拉姆斯菲尔德等美方政要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使美方再次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敏感性,美方纵容“台独”的言行因此有所收敛;同年5月中旬和下旬,美国副防长沃尔福威茨两次公开表示美国反对台湾独立;陈水扁在同年8月3日抛出“一边一国论”后,布什当局重申坚持“一中”政策和不支持台湾独立。

2002年10月22~25日,江泽民访美。布什特地在自家农场款待江泽民,双方就反恐反扩散、伊拉克问题、朝鲜核危机和台湾问题等进行深入会谈并达成一些重要共识:恐怖主义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严重威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扩散有利于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因此必须加强反恐反扩散合作;伊拉克必须全面遵守联合国有关决议;通过谈判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在台湾问题上,中方希望美方发挥建设性作用,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息;美方表示坚持“一中”政策和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台湾独立。

虽然伊拉克战争不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但是2003年6月和10月,布什先后在法国和泰国与胡锦涛会晤时都表示反对台湾独立,并感谢中国为化解朝鲜核危机做出的努力。

2003年12月8~11日,温家宝正式访美,主要就台湾问题、中美贸易摩擦和朝鲜核危机与布什进行深入会谈,达成了“反对台湾通过‘公投’搞‘台独’”的重要共识。此后,每当“台独”势力接近中国内地动武的“红线”时,美方都向台湾当局发出警告。2004年4月,因伊战而推迟一年的切尼访华终于成行。

2005年9月,胡锦涛与布什在纽约会晤,就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朝鲜核危机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就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达成共识。2005年11月,布什再次访华。2006年4月,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首次正式访美,双方再次强调全面推进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共识。同年7月中旬,布什在G8峰会期间与胡锦涛会晤,首次表示反对导致“台独”的任何单方面行为。

在首脑频繁会晤的同时,中美加强反恐反扩散合作,逐渐恢复军事交往,开始战略对话。

2002年8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访华时首次称“东突”是恐怖组织。同年9月,中美联合其他一些国家成功地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冻结“东突”资产和对其实施武器禁运的决议。与此同时,中国公布了《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的出口管制条例》及与之配套的《管制清单》,从而使中美在导弹技术控制问题上的分歧有所缩小。在同年10月江泽民访美前夕,中国又先后公布了《关于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的出口管制条例》和《关于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的出口管制条例》,显示了中国在防扩散领域与美国合作的诚意。

2002年6月,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罗德曼来华,就中美两军恢复交往与中方磋商。同年10月,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访华表明撞机事件后美方单方面实施的两军交流禁令被取消。此后,除了两国舰队多次互访外,中美两军高层交往不断: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于2003年10月底访美;美国参联会主席迈尔斯、副国防部长费思、太平洋战区司令法戈分别于2004年1月、2月、7月访华;2005年8月,美国新任太平洋战区司令法仑访华;同年10月18~20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访华把中美两军的交往恢复到最高层级;2006年5月初法仑再次访华时邀请中国军人观摩美军6月下旬在关岛举行的军演;同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访美。2005年8月初和12月初,中美先后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常务副外长级战略对话,对涉及双方的几乎所有重大双边和国际问题进行坦诚对话。

总之,随着“9·11”后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全面展开,特别是在美国深陷伊拉克泥淖和朝鲜核危机、伊朗核危机加剧的严峻形势下,美国在反恐、反扩散领域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因而采取一些促进中美关系的措施。在中国的积极努力与配合下,美国对华政策这种有限但积极的调整使中美关系明显改善。

二、“9·11”后中美结构性矛盾依旧

然而,“9·11”后中美关系继续受双方在人权、军控、地缘战略等领域的结构性矛盾的制约,尤其是受美国“以台制华”战略强化的制约。

“9·11”后中美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结构性矛盾依旧,具体表现为双方在人权问题上仍根本对立。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坚持对华强硬立场,继续指责中国政府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政治自由。在2001年10月的中美首脑会谈中,布什甚至告诫江泽民不要以反恐为由迫害国内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2002年2月,布什在清华大学讲演时,极力宣扬美国的宗教信仰、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观,故意突出中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不同,流露出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不满。

美国白宫于2002年9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在中国开始摒弃共产党遗留下来的最坏特征25年之后，中国领导人尚未对他们国家的性质做出下一步的一系列根本选择”；“中国领导人正在发现，经济自由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迟早，他们将会发现社会和政治自由是国家昌盛的唯一源泉。”白宫于2006年3月公布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从根本上讲，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白，他们在不给中国人集会、言论和信仰自由的同时，不可能让他们享有不断增加的买卖和生产自由。只有让中国人民享有他们的基本自由和普适权利，中国才能够尊重自己的宪法和兑现自己承诺的国际义务，才能充分发挥其潜能。”2002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在每年的国别人权报告中仍指责中国政府践踏人权，中国政府每年则以发表美国的年度人权记录进行反驳。2003年10月初，美国“国会一行政中国委员会”首次发表报告，攻击中国政府压制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遭到中国的反驳。2004年3月，美国又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出反华议案，中国则中止与美国的人权对话。美国以中国违反人权为理由之一，不仅维持“6·4”事件后实施的对华武器禁售，而且极力阻止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售和严格限制以色列与中国的军火贸易。美国继续以人权为借口干涉西藏问题和香港问题。2003年9月，鲍威尔和布什先后会见达赖。2004年3月，美方邀请香港反政府人士李柱铭等人出席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听证会。

MD问题是近年来中美在军控与战略安全领域斗争的一大焦点。“9·11”后美国不是像中国期望的那样放弃或延缓而是加快MD的研发，于2001年12月正式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半年后在阿拉斯加动工修建反导基地，并于2004年7月在此部署了第一套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美国以防止朝鲜等“流氓国家”的导弹袭击为借口，斥巨资研制和部署MD，其真实意图主要是防范和遏制中国，因为“流氓国家”没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而俄罗斯强大的战略攻击力量是MD难以防范的。基辛格的话就是证明，他认为美国应明确表示MD也是为了对付不是“流氓国家”的核大国^[2]（第69页）。而且，美国把日本拉入TMD后，逐步把台湾纳入其中，除计划向台出售爱国者3型导弹外，可能向台湾出售宙斯盾战舰。

“9·11”后，美国继续在地缘战略上防范与遏制中国，构筑潜在对华军事包围圈：借反恐之机大举进军中亚并控制阿富汗，扩大在东南亚和南亚的军事存在，加强美菲等双边军事同盟；在反恐的同时不断强化美印军事合作，发展与越南的军事关系并企图租借金兰湾，不断加强以关岛为中心的西太平洋军事部署，不断强化针对台海和朝鲜半岛的美日军事同盟（2005年10月的美日“2+2”会议达成的军事一体化协议和2006年7月美国借朝鲜发射导弹提前在日本部署反导系统是两个最新的证明），制定以中国为假想敌的美日联合作战计划。美国把从中东经中亚和南亚到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不稳定弧”地带当作军事干涉的重点地区，使中美地缘战略矛盾更趋复杂。

2005年上半年，“中国全面威胁论”（即中国在经济、军事、能源等多方面都对美国构成威胁）在美国甚嚣尘上，官方、军方、智库、反华团体相互呼应。2005年3月，拉姆斯菲尔德在国会说，中国军力的迅速增长是美国在制定长期防务计划时“主要关注的方面”。同年6月初，他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对话会议上公开质问：中国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威胁，为什么中国要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同年5月15日，美国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美国在亚洲只要两种选择，一是放弃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二是采取措施遏制中国的雄心。”美国另一位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普兰在2005年6月出版的《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我们应该如何与中国作战：下一场新冷战》。同月底，布什提名担任美国空军总参谋长的莫塞里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甚至说，他上任后的工作重点是考虑以多大的空中力量对付中国军队。美国国防部同年7月出台的《中国军力报告》继承了前几个报告的基调，成倍夸大中国军费开支，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论”，称中国军力的增强正在损害东亚地区的军事平衡。

“9·11”后，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支持更加坚定。中国曾希望布什当局重申克林顿的对台“三不支持”承诺，但是遭到美国政府拒绝。美国国防部在“9·11”后不久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把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海滨区”定义为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它在同年年底向国会提交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竟称要在中国武力攻台时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布什在2002年2月访华时只字不提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却重申美国将继续按《与台湾关系法》(TRA)帮助台湾提升必要自卫能力。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在中国强调要恪守TRA这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美国国内法。布什还三次回避“TMD是否将涵盖台湾”的记者提问，暴露了美国将台湾纳入TMD的意图。同年4月，布什在一次演讲中竟把台湾称为“台湾共和国”。美国国防部自2002年以来发表的五个关于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都指责中国内地军备的大幅增加对台湾构成严重威胁，2004年的报告甚至间接教唆台湾以大陆沿海大城市和三峡大坝作为可能的攻击目标。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只字不提“一中”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却把台湾称作“民主台湾”和“朋友”，并与中国并提，声称要按TRA致力于台湾防卫能力的提高。2003年12月，布什与温家宝会谈时表示，美国反对中国内地或台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重申TRA作为其介入台海争端、庇护台湾的法理依据。2005年2月，美日华盛顿“2+2”会议后发表的共同宣言

首次把确保台海和平作为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之一。

为了支持台湾以武拒统和为未来美台联合作战做准备,美国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与高层往来,提升售台武器数量和质量,与台湾联合研制武器装备,加紧培训台军高级指挥员和先进武器操作员,整合美台通信、监控和情报系统。2002年3月,美国首次允许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赴美参加该年度美台防卫高峰会,并表示将尽力帮助台湾提升防御能力,重申将依据1982年里根当局对台“六项保证”处理对台军售问题。“9·11”后美军事小组每年都观摩台军“汉光”演习,并在2003年首次参加演习。从2001年下半年始,美国在两年内为台湾培训了2000多名将校级军官,并向台湾派出许多“战力评估团”和“观察指导团”。2004年年底,布什当局根据国会授权决定于2005年8月向美国在台协会(AIT)派遣不穿军服的现役上校军官(该官已如期到任)。

2003年10~11月间,在“台独”势力疯狂进行“公投”活动时,美国以更高的礼遇让陈水扁第三次“过境”,鲍威尔在巴拿马与陈水扁在“不期而遇”中握手。同年11月27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含有所谓“防御性公投”条款的“公投法”后,美国国务院虽然表示“反对任何可能改变台湾地位或迈向‘台独’的‘公投’”,但是又“令人费解”地说,“美国反对台湾举办会导致‘台独’的‘公投’,不能被引申为美国反对‘台独’,美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3](第1,16版)。

“9·11”后美国国会仍不断通过议案和法案,要求进一步加强美台关系。2001年12月,美国众院通过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法案。2002年4月和2003年9月,美国众参两院分别成立支持台湾的“台湾小组”。美国众参两院于2002年5~6月通过的《2003财年对外拨款法》要求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和提升售台武器规模与质量,于同年8~9月通过的《2003财年国防授权法》和《2003财年对外关系授权法》都把台湾视为“非北约盟国”。2003年1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全力支持台湾“公投”的议案。200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2005年国防授权法》,把美台军事交流的级别提升到将军级和副助理国防部长级。同年6月,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报告公然鼓吹重新考虑“一中”政策。同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重申对《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的共同决议案。

可见,作为中美关系稳定的基石而被美国政府一直挂在嘴边的“一中”政策徒有其名。“尽管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尚存,但其性质和内涵已出现值得警惕的变化。”^[4](第438页)“对台军售的增加,防卫合作的巩固,以及美台外交联系的密切,显示了美国对台湾正式独立的更大支持,同时这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利益提出了挑战。”^[5](第51页)自布什上台开始升温的美台军事关系并未受“9·11”后中美反恐反扩散合作的影响,美国不仅没有放弃“以台制华”战略,反而变本加厉地从台海两岸政治对抗和军备竞赛中渔利。中断了20多年的美台军事协防关系已死灰复燃,美台已成为有实无名的军事盟友,台湾成了美国遏制中国内地不可替代的“王牌”。在美国看来,“只要台湾独立于北京,中国相当一部分力量和资源的增长就会被台湾问题消化和吸收,这将有效地防止中国在该地区同美国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能力。”^[6](第35页)

“9·11”后出现了中美关系改善、美台关系加强而台海两岸关系不断恶化的“奇特现象”,美国是中美台“三角博弈”唯一的暂时赢家。法理上属于一国而现实中又尖锐对立的台海两岸,以不同动机与极力从中渔利的美国发展关系,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也是国际法的悲哀。但是,由于台湾问题关涉中国领土主权这一核心国家利益,因此美台实质关系的加强制约着中美关系的改善。正如戴维·蓝普顿所言:“实质上,布什行政当局一方面一直都在要求北京在我们的安全重点上合作,另一方面却在中国的首要安全担忧即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提出挑战。这除了削弱北京合作的激励因素外,还会使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大。”^[7](第302页)

虽然“9·11”后中美经贸关系继续快速发展,但是,由于受意识形态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干扰和美国在战略上防范中国,中美经贸关系趋于“安全化”。美国基于社会制度偏见至今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因而自2003年夏天以来频繁针对中国彩电、纺织品、家具等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2004年,布什当局与美国一些劳工组织和国会议员一唱一和,以美国制造业受到中国低价产品威胁为由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挑起人民币汇率争端。2005年5月,美国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要求人民币在6个月内升值。同年4~7月间,美国众议院总共提出了6个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提案。同年7月中旬,美国总统布什公开表示,中国在人民币币值上的立场是美中经贸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在人民币于7月与美元脱钩并对美元一次性升值2.1%之后,美国要求人民币继续升值。美国政府滥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保护性条款,自2005年5月下旬以来已对中国9种纺织品实施紧急设限。2005年6~7月间,美国国会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连续通过决议,阻止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美国还经常拿对华贸易逆差对中国施压,但实际上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不仅给美国消费者以巨大实惠,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不公正的外贸统计方法“制造”出来的,也是由美国对华出口限制造成的。美国反华势力甚至认为中美经贸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2002年7月中旬,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表的《美中安全关系评估》报告认为:不仅中国对周边国家构成军事威胁,而且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损

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因为中国正在利用巨额对美贸易顺差加强军事力量。

三、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决定了“9·11”后中美关系改善的有限性

“9·11”后中美关系改善的有限性根源于“9·11”后美国“高调反恐反扩散和低调遏制潜在敌人”的全球霸权战略以及由此决定的中美在反恐反扩散中的深层分歧和双方首要安全关切的不同。

“9·11”后,美国仍视中国为主要潜在对手,仍企图通过“强硬接触和有限合作”实现遏制中国崛起和演变中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强化“以台制华”战略,在反恐反扩散中悄悄构筑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借反恐反扩散推行世界单极化。尽管中美两国在反恐战争初期的合作是诚心诚意的,但合作范围和深度受到种种限制,它不是基于战略眼光和根本价值观吻合的结果,而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虽然中美反恐反扩散合作使中美关系明显改善,但是这种改善是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后的恢复性改善,基本上是“9·11”后美国对华策略性调整的产物,不属于战略性改变。具体而言,“9·11”后中美关系改善的有限性的原因是:

第一,虽然“9·11”后反恐反扩散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怀疑依旧,实际上没有放松对中国的防范与遏制。“‘反恐战略’地位突显主要意味着美全球战略腾挪与转圜过程中优先次序的临时变动,而非战略结构发生本质性的变化。”^[8](第58页)美国并没有因反恐而实质性地放松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遏制,只是被迫暂时让“反恐”优先于“制华”,即高调反恐,低调制华,右手反恐,左手制华,甚至在反恐中制华。“9·11”后形成的“布什主义的实际运用归结为既击退恐怖主义,同时也遏制中国,防范它崛起为强权”^[9](第1页)。在美国看来,虽然恐怖主义是严重威胁,但真正能威胁其霸权地位的是新的世界大国的崛起。“9·11”后不久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在强调恐怖主义等“非对称性威胁”的同时,仍强调“亚太地区大国崛起的潜在危险”和美国的主要威胁是“潜在的地区力量挑战”,认为“中国正在寻求可以威胁到亚太邻国的军事力量”,会成为美国的“全球竞争对手”。白宫于2006年3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加重了对中国的怀疑和指责:“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白,在他们坚持其加剧相关地区和世界的担忧的旧思维 and 旧行为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沿着和平之路走下去。这些旧思维和行为包括:以非透明方式继续军事扩张;扩张贸易的行为好像他们能以某种方式‘锁定’全球能源供应或寻求控制而非开放市场——好像他们遵循从非诚信时代借来的重商主义;支持资源富有国(主要指委内瑞拉、苏丹、伊朗等国——笔者注),而不管它们在国内的错误规章和在国外的不当行为。”

第二,美国的全球反恐“所反的只是危害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而非危及全球的恐怖主义,其价值观因素和单边主义色彩仍很浓厚”^[8](第58-59页)。因此,中美在如何定义和消除恐怖主义及如何对待“邪恶轴心国家”、“流氓国家”、“失败国家”的问题上的明显分歧——美国一贯按自己的好恶定义和判断恐怖主义,搞双重标准,并坚持要对恐怖组织与“邪恶轴心国家”、“流氓国家”、“失败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中国则一视同仁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调对恐怖主义进行标本兼治,主张依据现行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反恐引发的国际争端——妨碍了双方进行密切的反恐合作。中美间缺乏政治互信使“两国政府(‘9·11’后)只是犹豫不决地进入了一个有限安全合作的框架”^[10](第106页)。

第三,中美各自的首要安全关切不同。美国视恐怖主义与WMD的结合为头号现实威胁,而中国视其为次要威胁。中国把“台独”视为最大和最紧迫威胁,把美国霸权视为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的最大外部障碍,而美国把中国不承诺放弃对台动武视为严重威胁,并极力防范中国挑战其霸权地位。因此,中美反恐反扩散合作虽然符合双方利益,但是并非像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反苏合作那样在中美关系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

因此,“9·11”后中美关系不仅没有达到30余年来的最好状态,而且从战略安全角度看远不及“6·4”事件前的中美“准盟友”关系。

[参 考 文 献]

- [1] 沈大伟. 美中新稳定:原因与结果[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 (10).
- [2] 亨利·基辛格. 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3.
- [3] 任毓, 京翼. 美对台当局不耐烦[J]. 环球时报, 2003-12-05.
- [4] 梁茂信. 美国社会发展与中美交流[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5] 陆伯彬. 穿越台湾海峡——威慑、升级控制与中美关系[J]. 国际政治研究, 2004, (1).
- [6] 倪世雄, 刘永涛. 美国问题研究:第3辑[M].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2.

- [7] 胡安钢, 门洪华. 解读美国大战略[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8] 傅梦孜. 关于“反恐时代”美国全球战略风向问题[J]. 太平洋学报, 2003, (3).
- [9] Donnelly, Tomas. What's Next? Preserving American Primacy, Institutionalizing Unipolarity[N]. National Security Outlook, AEI online(Washington), 2003-05-01.
- [10] Lampton, David M. Small Mercies; China and America After 9 ° 11[J].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01, (Winter).

(责任编辑 叶娟丽)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Sino-US Relations after 9 ° 11 Incident

ZHENG Baoguo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60,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ENG Baoguo (1959-),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majoring in US foreign policy and Sino-US relations.

Abstract: Sino-US relations have been considerably improved since the 9 ° 11 incident because of Sino-US cooperations in fighting terrorism and proliferation of WMD. but the improvement is not unlimited. Sino-US relationship has only been restoratively improved which began deteriorating when George W. Bush came to power in Jan. 2001, so it has not reached its best. This is because of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fter 9 ° 11 whose ultimate goal is to preserve American primacy and pursue global hegemony in the course of fighting terrorism and proliferation of WMD.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goal requires either continuation of containing China with “the Taiwan Card” and the solidification of US-Japan alliance or integrating China into US-led world order, and so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of human rights, Taiwan issue, missile defense and geopolitics in Sino-US relations remain the same.

Key words: after 9 ° 11; Sino-US relations; anti-terrorism; Taiwan issue; restorative improvement